

顿巴斯

戈尔巴托夫著



Dunbasi

上海译文出版社



Dunbasi

顿巴斯

〔苏〕戈尔巴托夫著 草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Б. Л. Горбатов

ДОНБАСС

根据苏联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1 年版译出

顿 巴 斯

〔苏〕戈尔巴托夫 著

草 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30,000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7,000 册

书号: 10188·538 定价: 1.70 元

劳 动 的 诗 篇

(代序)^①

斯达哈诺夫运动是现代最惊人最伟大的运动之一。它从顿巴斯的中央伊尔明诺矿开始，很快就普及到整个苏联，让全世界人士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潜藏着无穷的创造力。继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运动的最初几个发起人而起的，照《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的说法，“还有其他的先驱分子，还有整批整批超过了第一批先驱分子劳动生产率的先驱分子。”^②顿巴斯采煤工阿历克赛·斯达哈诺夫和他之前的尼基塔·伊索托夫的创举，马上受到各行各业男女工人的响应，其中有织工、铸钢工、铁工、机工、建筑工和火车司机。“斯达哈诺夫运动是我国工业未来之花，”^③斯大林当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旧的技术定额、旧的生产标准和旧的生产计划，都被新生的洪流冲洗一清，进步思想战胜了保守观点，新事物向旧事物挑战。

戈尔巴托夫在他的长篇小说《顿巴斯》里，描写了这个意义重大的时期。通过马丽雅矿的两个青年矿工和他们的一些同事，作者成功地显示了苏联工人阶级本身在这几年中所发生的重大改变。

本书的主角安德烈和维克多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出生在一个叫企比略基的小镇里。他们的成名是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的。他们体验过一切——对矿井的恐惧、做新矿工无法避免的困难和不习惯于严格的劳动纪律。维克多·阿勃罗西莫夫起初不能自持，以至打定主意想离开马丽雅矿。然而，安德烈的不渝的友情终于把他从可耻的行为中拯救出来。安德烈·伏龙科在火车站上找到了他的朋友并且说服他回矿上工作。这些困难和考验锻炼着两个青年矿工的心。

他们在矿上并不感到孤独。他们有许多良师益友——奥尼辛叔叔，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煤矿；共青团组长斯维特里，一个不知疲倦的心地很好的人，他把人家的一切事情都看作是自己的事情；永远不会老的列斯尼亚克叔叔，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丰富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人；马丽雅矿的党组长聂察英科，他谨慎而热情地引导青年克服他们在新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在所有这些人的热心照顾下，安德烈和维克多逐渐成长，获得了信心和经验。

安德烈·伏龙科和维克多·阿勃罗西莫夫为采用新的工作法而进行斗争，这是本书的主题。在这个斗争中是没有袖手旁观的人的。我们可以看到象格鲁施科夫工程师那样的消极的反对者，也可以看到象罗亭和马基楚克那样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的死敌。然而，维克多·阿勃罗西莫夫却手拿风镐，在工作面上显示了自己的勇敢。他的生产记录受到马丽雅矿上他的许多朋友和顿巴斯其他各矿矿工们的挑战。他那风镐的声音在全国各地

① 本文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本书英译本译出，作者未署名。

② 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人民出版社，第十二章，第442页。

③ 同上，第444页。

获得反响。显然，这种向旧事物挑战的热烈愿望，早就在群众中成熟了。“大家有一种感觉，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一下子离开了原位，摆脱了常规，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因袭的垣墙倒塌了，陈旧的堤岸决口了，人的面前突然打开了一望无际的前途，使人惊奇得目瞪口呆。”

这些勇敢果断的孩子的大胆梦想实现了。他们的名字传遍了顿巴斯。最后，安德烈和维克多随着顿巴斯著名人物的代表团去到了莫斯科，他们的心愿也实现了。当他们的列车驶入这个伟大的城市时，矿工们在莫斯科车站闻到了亲切的煤的气味，他们感动极了。“‘瞧吧！’维克多跳到月台上，眉飞色舞地说。‘这是我们的煤味儿！’”首都人士热烈地招待他们的贵宾。矿工们实现了他们多年的宿愿，看到了庄严雄伟的红场。

但是，安德烈·伏龙科逗留在莫斯科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他被请到克里姆林宫去见斯大林的那一天。“这当儿，他觉得跟他一起握住斯大林的手的，还有维克多，还有列斯尼亚克叔叔，还有老祖宗，还有奥尼辛叔叔，还有米佳·查柯尔科，还有达莎以及马丽雅矿的全体党员，全体矿工和所有的人们。他，安德烈·伏龙科，马丽雅矿的党委书记，是代表他们跟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握手的。”斯大林给安德烈展示了顿巴斯的远景。安德烈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斯大林的亲切谈话，那间陈设很朴素的办公室和隔窗望得见天空的克里姆林宫。

这部关于顿尼茨地方和它的出色人物的小说，作者是怀着真情和热爱写的。头发灰白的老矿工列斯尼亚克在谈到他的祖先时，神气活现地大声说：“我们虽然不是贵族，但是记得自己的根源。我们开发了这些矿井，我们给了这片草原以生命！”这个人物的性格描写是不能不使人称赞的。读者在谢辽查·奥且列

金身上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性格。他本来是一个轻率的顽童，但在激励人的工作和矿上朋友们的影响下终于变成了一名优秀的矿工。那个生有一头红棕色鬈发的小伙子米佳·查柯尔科，不论在工作上，还是在跳舞上，都不愿输给他的对手维克多，是一个逗人喜爱的人物。还有，矿工姑娘达莎在矿井里做过换矿灯的工作，矿工们就管她叫“萤火虫”。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有趣，很可爱。

本书的两个主角——维克多和安德烈，作者是从发展的观点来描写的。

顿尼茨的风景写得非常细腻动人——青草芳香夹杂着冒烟的矸子气味的草原，云霞飞翔的灿烂的落日景象以及月光如水的春天的夜晚。戈尔巴托夫笔下的景色总是离不开人的，总是受到人类呼吸和劳动的温暖的，而这块严肃的土地也领受着人的热爱，人使它的面目永远在改变和进步中。

这本描写三十年代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生活的书，对培养年轻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性格，作用很大，在苏联读者中享有普遍的好评。

第一部

两个好朋友

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维克多，一个叫安德烈。在一九三〇年，他们两人的年纪加起来，一共三十五岁。

“树叶子都发黄了！”维克多指着普晓河上漂着的几片枫叶，闷闷不乐地说。“老兄，我们也该打个主意了！”

安德烈一声不响，只是耸耸肩膀。

两人用羡慕的目光凝视着一张枯黄的手掌形枫叶，瞧了好一阵，瞧它怎样在水面上一起一伏地打转，怎样顺着河水漂流，越漂越远，越漂越远，直向海洋。枫叶在漂流，可是他们却仍旧坐在老地方。

他们两人，生在同一年，住在同一条街上，进了学校，同坐一张课桌。他们有着共同的课本、共同的鸽子、共同的幻想。他们从未想到，他们将来可能走两条不同的路。

每天早晨，每天黄昏，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说：“不，得走了，得走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开本乡一步。

他们住在企比略基，这是普晓河畔的一个小镇。他们生在这里——维克多生在一所花瓦屋顶的白色小房子里，安德烈生在一所绿铁皮屋顶的蓝色小房子里。他们在这里长大，在这片草地上奔跑嬉戏，夜里常常仰望天上的那几颗星星。可是现在

他们却决定要抛下这一切，永远地抛下这一切。

“你为什么不想当海军，安德烈？”维克多怒气冲冲地问。“老兄，当海军可以在大海洋里航行啊！”

他们从来没看到过大洋，就连海、大河和大城市也没见过。四层楼的房子，他们只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他们生下来到现在有十七个半年头，一直住在这里，住在这条街上；而所谓街呢，实际上只是一道篱笆紧接着一道篱笆罢了。整条街都长满野草：一种是蒺藜，一种是狗尾草。风吹草动，蒺藜上就扬起一阵干燥的银色花粉。

这条街，从来不曾有汽车经过，就连大车的声音也难得听到，因为它离开大路太远了。这里，车轮的痕迹从来不会通到远处去，它们总是急速地弯进院子，好象世界上条条道路都只通打谷场，而谷仓也就是路的尽头。

“说不定还会让我们去开潜水艇呢，”维克多说。“理由很简单。我们的身体都很强壮。你说怎么样，安德烈？”

他们出生的那条街，两边都是花园、庭园和菜园；而且这里的花园都有茂盛的花木，丰富的果实；花园四周的篱笆都很整齐；菜园种得极好，照顾得很周到，里面没有一根杂草；还有那窗下的蜀葵花，红红的，又鲜艳，又饱满，好象一个个漂亮而骄傲的待嫁的乡下姑娘。这里的小房子全都隐设在美丽而浓密的绿荫丛中。房子疏疏落落地东一座，西一座，仿佛在这条街上和这里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房子，而是花园和菜园。这里的房子都很矮小、阴暗，墙壁都是泥砌的，所不同的就是屋顶：屋顶极少数用铁皮，也有用瓦，但最多还是那种象哥萨克头发一样剪成圆形和两面分开的草屋顶，或者用灰色的枯芦苇盖的。仙鹤喜欢在这样的草屋顶上做窠。据说，仙鹤会带给人幸福。这条

街上，就栖居着许多仙鹤。晚上，它们象哨兵一样排列在屋顶上，一只脚缩着，一只脚站着，严肃而威武地守卫着它们所带给人们的幸福。

“不！”安德烈低低地说。“我不想当海军！”

“那末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安德烈！”维克多烦恼地嚷开了。

维克多没有父亲。他的父亲是个布尔什维克，现在长眠在企比略基中心的小公园里，长眠在烈士公墓里。差不多每逢星期日，维克多的母亲从市场回来，总要带一个小小的花圈到墓地上去，并且依照习惯，总要先哭几声，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花圈放在墓碑的脚下。这座墓合葬着几个人，而这一点，常常使维克多的母亲觉得难过。丈夫就在死后也不属于她——他跟同志们躺在一起。

维克多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纯朴的女人，从前怯生生地爱丈夫，同时又怕丈夫，现在她爱儿子，同样也怕儿子。儿子任性、倔强、脾气大，象父亲。而作母亲的也早就猜到，在她的窝里，儿子觉得气闷，不舒服。他很快就要飞了。她已经在替他缝出门用的手巾和衬衫，一面缝，一面哭。

“或者，去念书吧，嗯？”安德烈怯生生地说。“区委里入学证多着哪。”

“念书吗？”维克多哼了一声。“你裤子磨课桌磨得还不够吗！……这么说来，你不想当海军；那末，进航空学校吧。”

安德烈的双亲都健在。父亲在制粉厂里当机匠，安德烈小时候，总觉得父亲是一个魔术师。在厂里，工人们的身上洒满了白面粉，只有他一个人是黑色的，也只有在他一个人身上，闻得到那种甜腻腻的、不是本地所有的柴油和机油的气味，还有那个怪东西——发动机，也只听他一个人指挥。安德烈因为有这

样一个父亲而骄傲，同时又暗中可怜他。

安德烈的父亲最爱谈自己的往事，谈起来极其动听。他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的：“这还是我结婚以前的事……”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流浪和冒险中度过的，过得很了不起。他航过海，在铁路上做过事，跑过许多码头。他总是“跟住机器”，让柴油发动机来支配他忙碌的生活。后来他突然结婚了，并且在这里定居下来。他的故事也就这么结束了：“好了，后来我结婚了。”再下去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讲了，而且就是有，也是没有趣味的了。

安德烈自以为很了解父亲，——父亲是不幸的。有时他很想走到父亲跟前，直率地说：“爸，让我们离开这儿吧！嗯？你、我、维克多——背起袋子，走！”但是安德烈并没有这样作，因为他知道母亲会闹的！他有些怕母亲。他对母亲说话用“您”，对父亲用“你”。

事实上，从安德烈父亲的外貌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幸来。他不论对什么人都要嘲笑：对自己、对老婆、对邻居，都一样；但他的嘲笑很天真，很和气，不怀恶意。人们都喜欢他。

他每天放工回家，洗了脸，吃了饭，总是到花园里去，徘徊在苗垄之间。这片绿色的世界，虽然不是属于他的，而是由他老婆管理着，但是他也象所有做工的人那样，热爱花草树木。他爱蹲在苗垄间，老是又惊又喜地察看幼苗的生长，好象察看什么奇迹一样，同时倾听青草和草丛里虫类的音乐，呼吸湿润的泥土的气息和鲜花的芳香……在这个绿色的世界里，在这条街上和他自己的家里，洋溢着一种特殊的宁静。在这种宁静中，生命无声无息地、不知不觉地成长着，死亡着和重新诞生着：杨柳长出了嫩芽，牵牛花沿着绳子爬上屋顶，又朝着太阳，开出一朵朵青底黄纹的喇叭，并且好象在吹出集合的号声；芳香的青草在农家的泥

地上甜蜜地默默枯死；晚上，庭园里素静的紫罗兰突然精神百倍地开放了，它们那种扑鼻的浓香，笼罩了大地上的一切，并且跟浸蜜的土烟草——安德烈父亲心爱的烟草——的甜香混和在一起。这就是幸福。

安德烈自然无法理解：这种宁静也就是父亲的幸福。有工作，有老老实实挣来的好面包，这是幸福，何况还有自己的小房子，房子里关上百叶窗，又是一片清凉的阴暗，夜里还可以用铁栓锁上百叶窗，还有笼罩着大地的一片宁静，而在这片宁静中，孩子们在成长，番茄幼苗也在生长，牵牛花用自己的喇叭，吹出快乐的生活颂歌。这是幸福，虽然仙鹤不在铁皮的屋顶上做窠。

如果为了要到人地生疏的远方去作荒唐和疲劳的旅行，就得抛下所有这些惨淡经营和住惯用惯的东西，不论安德烈的双亲，或者维克多的母亲，以及住在这条街上的许多人，都将认为这是一种不幸。

那末，幸福到底是什么呢？要是安德烈和维克多知道他们得在企比略基过一辈子，得在老家的这条街上住到老，并且死在这里，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不，不，随便到哪儿去都行，只是不要留在这里！就是到聂静去也行，到那个邻近的、同样荒僻的、没有一所制粉专科学校的聂静去也行，只是不要留在企比略基。此刻对于这两个男孩子说来，所谓“生活”，就是“动”。在十七岁的年纪上，他们还不懂得爱故乡，他们认为故乡平凡无奇，除了在那里出生之外，一无特色。人们对身穿破旧棉袄、识字不多、心地善良的老母亲发生深挚的爱，往往要等到长大之后。人们对于故乡的爱，也是这样的。

“不！”维克多又决断又凶狠地说。“真的，我们得打个主意了，安德烈。时间不等人哪……”

是的，时间不等人。它象普晓河里的水一样，流得不知去向。每过一天，就是失去一天。不，得走了。

从前小的时候，孩子们认为普晓河上的这座峭壁，就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个现实世界的尽头。那边，河的对岸，就已经是一个幻想的世界——青黄两色的世界了。那边的树林子青得跟这儿不一样，树林子上面的天空也蓝得不一樣，还有，黄色的砂泥和金色的小麦也都跟这儿的不同。那边，黄铜色的松树丛中，耸立着一座青色的坟山，坟山里枯朽着的骨头，要不是哥萨克人的，就是瑞典人的。那时安德烈和维克多还不会游泳。

后来他们学会了游泳，就游到普晓河的对岸去了。他们看到那边的世界，原来也跟企比略基一样平凡。而且，树林子也跟别处相同，它们的颜色不是青的，而是绿的，树林子里同样是凉快、阴暗、潮湿的，同样闻得到蘑菇和死水的气味，树林子上面的天空，也象企比略基的上空一样，是平平常常的。至于那边村子里的房子，跟他们街上的房子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加简陋一些。农人们坐在坟山上喝烧酒，拿黄瓜当点心吃，并且交互讲着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悲伤凄惨，就是下流无耻。

不，必须走得远一些，远一些——必须离开普晓河，到真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去。

是的，得走了。这已经决定了。难道就这么在关着的百叶窗里过一辈子吗？就象牵牛花似的沿着一条绳子往上爬吗？就象这些傻头傻脑、沾沾自喜的蜀葵那样，生在老家的庭园里，死在老家的庭园里吗？蜀葵在乌克兰叫“红脸儿”。红脸的、自命不凡的蜀葵——不，得走了，得走了！杨花在城市上空漫天飞舞，号召他们动身。普晓河的波浪急急地冲打着一只橡木小船。

是的，得走了。这句话他们每天都要对自己说上百遍，可

是人却始终没离开本乡一步。

他们无法选出一条道路来。

安德烈的父亲在青年时代不曾选择过道路。他偶然落在机器旁边，柴油发动机就把他吸住了。自古以来，企比略基的男孩们纷纷投入生活，但从来不曾有一个人给自己选择过道路。机会决定一切。做父亲的去上工，就带着儿子，踏上祖父们走得烂熟的道路；作亲戚的记起了远在企比略基的外甥，就把他叫到自己跟前，替他找一份工作。就这样，企比略基的男孩们成了铜匠、泥水匠、酒店伙计，或者跑马场里的马夫，并非因为他们选择了这些职业，而是贫穷替他们决定了一切。结果，他们既没有什么人可以咒骂，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哭诉，于是也就只好做苦工，做到老。

至于安德烈和维克多，他们有机会可以选择。他们面前突然开辟了千百条道路。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一条。他们运气好，生得逢时。

那是一九三〇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举国上下正准备向未来迈进。千百年来形成的东西，一旦都摧枯拉朽地崩溃了。在古老的田间路上展开了一场大血战；那个刚被连根铲除的阶级，在退出历史时，乱叫乱咬，死命挣扎，于是，那些跟安德烈同年纪的共青团员，就面对着富农的短统枪口，大无畏地走上了前哨。其中有两个团员，两三天前牺牲了，用松板棺材装着抬到了企比略基，后来就葬在烈士公墓里，跟维克多的父亲并列着。

一种巨大的急迫心情突然控制了人们。他们觉得要完成他们所想望的一切，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人生实在太短促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和时间赛跑。他们要把五年的工作，在四年之内做完，在三年之内做完；他们想法子使机器越转越快，使混凝土

凝结的时间越来越短，使土地的出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繁盛。

人们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感到了自己双手的威力和集体努力的效果。一切都有了办法：征服沙漠，填平沼泽，改造社会，改变世界。土西铁路①刚要完成，就开始修治白海运河。北极在被征服中，科雷马②的原始森林在计划开发。斯大林格勒的机器装配工人在拖拉机工厂一完工，就搭长途的专车到东方去，到马格尼特草原③去，虽然大家都知道，那里原是一片荒野，人迹不到，黄砂遍地，狂风怒号，气候恶劣。

在那些年头，轧轧的车轮声，响遍了整个国家。一切都开动了，一切都上了路：有搭车的，有乘船的，有骑马的，有步行的，车厢在荒野上权充车站，帆布帐篷做了住屋，窑洞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和车站都是临时性的，人们在这里也是暂时的——背着工具赶路的人，——只有他们所做的工作，才是永久的。这是伟大的时代，其中充满痛苦的动荡和快乐的成就，它们的浪潮也已经冲到了企比略基。

整个国家充满理想，——试问企比略基的这两个孩子又怎能没有理想呢？整个国家热中于速度、空间、道路、基础沟和掘土机中，整个国家在运动，在前进，——试问我们的这两个孩子又怎能不向往远方呢？

他们只须在千万条陌生的道路中，选出自己的一条来——唯一的一条，也是正确的一条。

“漂亮的一条”，——这是维克多的说法；“正当的一条”，——这是安德烈的说法。

① 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简称。

② 科雷马，河名，在亚库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东北部。

③ 马格尼特草原在乌拉尔南部。